

方志史話

林衍经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专题史话丛书

方 志 史 话

林衍经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我国方志的起源、古方志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它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我国近代方志学的影响,以史话体的形式,作了较为系统的、通俗易懂的论述。是一本普及性的方志学读物,可供方志工作者和方志爱好者学习参考。

中国历史专题史话丛书

方 志 史 话

林 衍 经

责任编辑 张继红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解东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2.875印张55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8000册

统一书号12105·23 定价0.30元

写在前面

俗话说：“盛世修志。”从历史上看，修志虽不限于盛世，但盛世修志普遍，规模较大，出的志书较多，则是事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出现了大好形势。现在，我们正处在国家开始兴旺发达的盛世。在这个盛世局面下，于十年动乱中被迫中断的编纂新地方志的工作，又逐渐展开了，并且形成了遍及全国的热潮。这是十分喜人的新气象。

随着全国修志热潮的涌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对地方志知识发生了兴趣，而且这样的兴趣愈来愈浓厚、愈来愈强烈，甚至成为一种渴望了。这也是格外令人欣喜的新气象。群众中的这种愿望和需求，应当得到关心和满足。因此，就需要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多写一些宣传地方志知识的文章和书籍，作为一种精神食粮，供应给群众。这样的文章和书籍，可以是论著，也可以是比较通俗的普及性的读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后一种文章和书籍，可能还是更为迫切需要的。

中州书画社编辑部的同志们，对于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希望了解地方志知识的心情，十分关注。群众的需要，编辑同

志的热情，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有了勇气和信心，写成了《方志史话》这本小册子。

《方志史话》的宗旨，是从“史”的角度出发，向读者介绍地方志知识，没有涉及比较专门的学术性问题。但其中也吸收了地方志工作者的某些学术研究成果，因为这些内容对于了解地方志知识来说，是需要的，甚至是必要的。

采用史话的形式来介绍地方志知识，这是一个尝试，有错误和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使我能从中获得帮助和教益。读者的批评意见，可以由中州书画社编辑部转告，也欢迎直接向我提出，我将以愉快的心情，恭读并思索来自读者中的知音。

作 者

1983年1月21日

于安徽大学历史系

目 录

写在前面

- 第一章 地方志——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1)
 - 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宝库…………… (1)
 - 二、硕果是怎样得来的? …………… (5)
 - 三、地方志的珍贵价值…………… (10)
- 第二章 一桩公案——关于方志起源的争议…………… (15)
 - 一、古今各家对方志起源的不同见解…………… (15)
 - 二、千年公案引导我们思索…………… (19)
- 第三章 古方志发展的漫长岁月(上)…………… (23)
 - 一、《汉书·地理志》和各种地记的涌现…………… (23)
 - 二、“方志之祖”——《越绝书》、《吴越春秋》
和《华阳国志》…………… (27)
- 第四章 古方志发展的漫长岁月(中)…………… (32)
 - 一、官修志书的出现及其成就…………… (32)
 - 二、继往开来的宋代方志…………… (36)
 - 三、方志发展逆转时期的吉光片羽…………… (39)
- 第五章 古方志发展的漫长岁月(下)…………… (44)
 - 一、复苏后兴盛起来的明代方志…………… (44)

二、古方志发展全盛时期的透视·····	(49)
三、方志学的形成和章学诚的贡献·····	(53)
第六章 国难时势和地方志的沉沦·····	(59)
一、清代晚期的地方志·····	(59)
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	(63)
三、方志学在逆境中的发展·····	(69)
第七章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迈进新天地·····	(72)
一、新时代的开始和第一个修志热潮的起伏·····	(72)
二、国运重振和方兴未艾的第二个修志热潮·····	(76)
三、迈进新天地，谱写新篇章·····	(80)

第一章 地方志——一份珍贵的 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 文化宝库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个著称于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在祖国辽阔疆域上，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历代先辈们，不但用坚强有力的双手开发了富饶的土地，妆点了美丽的江山，而且以智慧和心血，培育和浇灌了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之花，建造了巍峨辉煌的中华文化瑰宝的殿堂。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炎黄子孙，以自己晶莹璀璨、光辉夺目的文化奇珍，博得了世界人民的称誉；伟大的中华民族，也因这些丰富多采的文化创造，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提起我们的民族文化，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起我国古代众多的科学技术发明和丰富奇妙的医药遗产，想起古代思想深邃的百家巨著和闪烁异彩的文学艺术，并因此而引以自豪。同时，也就会自然地缅怀起我国古往历史上那些伟大的

思想家，出色的科学家，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对他们充满由衷的敬意。敦煌的宝藏，故都的建筑，庄严的寺庙，雄伟的长城，华贵的陵寝，美妙的园林，固然令人赞叹称奇，流连忘返；金石碑刻，琴棋书画，名瓷古玩，百世稀珍，也无不惹人爱不释手，拍案叫绝。还有那古代雅音，美妙歌舞，杂技艺术，诸多戏曲，也都四海闻名，使举世引颈瞩目。但是，在百宝争辉的祖国文化宝库中，更有一种为世人所珍视的文化珍品，这就是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的地方志书。地方志书是我国的文化特产，是我们民族文化百卉中独放神采、无比鲜艳的一支奇葩。

我国的地方志书，数量很大。据调查，历代编写的地方志书，共有八千五百多种，计十万多卷。这些志书，有很多品类，因为记述的地域和对象有不同，所以有“总志”（或“一统志”）、“通志”、“府志”（或“郡志”）、“州志”、“县志”、“乡镇志”、“都邑志”和“卫志”、“所志”、“场志”、“山水志”、“寺庙志”等等之分。“山志”、“水志”、“寺庙志”、“学校志”等志书，所记的内容多侧重于一面，畸轻畸重，偏而不全，旧时传统便合称为“杂志”。有些邻近的两个县或几个县，过去曾有合修一部志书的情况，称为合志，例如安徽有《泗虹合志》，江苏有《无锡金匱县志》、《常昭合志》，四川有《续修叙永厅永宁县合志》。在地方志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名称往往有变化，有的因受当时史书名目变化的影响，把一些地方志书的名称叫做“记”或“书”、“史”、“典”、“考”、“鉴”、

“览”，而有的则因为某一志书的内容偏重在某一方面，名称也就随之变化，偏重地理的常以“地理”、“沿革”、“指南”等为名，偏重掌故的常以“掌故”、“典”、“故”等为名，偏重舆图的常以“图经”、“图说”、“图考”、“图志”等为名，偏重文征的常以“备征志”、“足征录”、“文献备考”等为名。尚未定稿的方志，通常以“志稿”、“未定稿”相称。同一地区多次修志的，往往以“新”、“旧”，“前”、“后”，“续”、“补”，“重修”、“新纂”等字样加以区别。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地方，因为历代建置有变迁，同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有几种名称，比如苏州，就有吴、吴地、吴州、吴郡、苏州、平江等不同的名称，还有姑苏、吴门、吴中等别名；因此，苏州的地方志，也就有《吴地记》、《苏州图经》、《吴郡志》、《姑苏志》等几种不同的名称。还有一些志书的编写者，为了表示崇高典雅，故意以旧名或别名相称的，例如元于钦的《齐乘》，实际便是山东志；卢镇的《琴川志》，则是常熟志；清汪中的《广陵通典》，又是扬州志。这些种类繁多、名称不一的地方志书，一如霄汉星斗，闪烁光辉，又似大地百卉，竞芳斗艳，都记载了当时当地的自然和社会情况，有很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上编修的地方志书，绝大部分是由历代政府收藏保存的，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都保存了为数不等的方志。清

朝建立后，为了编修《明史》、国史和《大清一统志》，就曾向各地征集了志书，保存在内阁大库（内阁存放档案的库房）。一些学者和私人，也收藏了一部分，明代嘉靖年间，浙江人范钦创办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便是收藏明代方志最多的一个场所，所藏的通志、府志、州志、县志，多达四百三十五种；这些志书，反映了十五至十七世纪中国各地府郡和州县的情况，很宝贵。

但是，历代编修的许多地方志书，由于保管不善，水火兵灾，受到很大损失。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酿成了令人齿寒的文字狱，使大量志书付之一炬，也给方志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和侵略者的掠夺，更使我国方志受到一场空前的浩劫。东方图书馆是收藏近代方志最多的单位，约有二千六百四十余种，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全部焚毁，化为灰烬！美国自1869年以来，就大量掠夺我国的地方志书，据1948年的统计，仅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处，就藏有从我国抢掠去的方志二千九百六十四种。英国在鸦片战争以来，也掠夺了不少地方志书，宁波天一阁的藏书中，就有《大明一统志》等地方志书被劫掠而去。其他如日、法、意、德、比等国家，也都用各种手段，收藏了我国大量的地方志书。这些流失到国外的地方志书中，有许多是海内孤本和珍本。祖国的文化珍宝受到这样惨重的损失，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啊！

新中国的成立，使地方志书在历尽劫难之后，获得了生

机。祖国丰富的文化宝库，得到了保护和充实，重新焕发了英姿。大量的珍本方志被复制出来了，免去了散失无存之忧，又为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还先后从日本复制了大约二百多种稀见方志。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也油印了新疆、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稀见方志十几种。我们党和国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怀爱护，是史无前例的。今后，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文化奇葩——地方志，能够光辉百世、万古流传了。

二、硕果是怎样得来的？

我国历史上产生的地方志书，称得上硕果累累。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地方志呢？有一个朱熹索志书的故事，可以给我们说明一点问题。

朱熹是南宋时的哲学家、教育家，曾经担任过政府的官职。一次，他到江西某地去上任，当地的属官们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搜肠刮肚，花费了不少心思，准备回答他可能提出询问的问题；为了讨取他的欢心，还准备好了礼物和酒席，远远地跪接。谁知朱熹这个官员同别的官员不一样，他撩开轿门，开口就问：“志书带来没有？”跪接他的属官们没想到朱熹刚来任所，脚未着地就先要看地方志，猛听到他这一问，个个面面相觑，无可奈何，痛感悔之莫及，显得十分狼狈。据说从此以后，这一带便形成了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常常先接交地方志书。

这个故事说明，朱熹是很注重地方志书的，因为他知道，从地方志里可以了解到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施政理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起到“资治”的作用。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要大力提倡编修地方志了。

历代统治者提倡编修地方志，是为了“存史”、“资治”、“兴利”、“裨风教”，以有助于他们的长治久安。但这样一提倡，也就给地方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有了好的条件，还得有人干才行，地方志书是由历朝历代千千万万人的努力，才编写出来的。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研究中国史的专家、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认为，中国地方志“是各地的学者长期以来辛勤工作而得出的硕果。”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历史实际。现在，我们不妨畅游一番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撷取其中最美丽、最有代表性的几朵浪花，作一点考察。

南宋时的新安（今安徽歙县）人祝穆，曾经撰写了一部重要的舆地志书，叫做《方輿胜览》，共七十卷。这部志书，略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而详于名胜古迹、诗赋序记，采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在这部志书孕育的过程中，作者花费的时间和心血，那是很惊人的。据吕午为这部志书写的序文说，祝穆曾往来闽浙江淮湖广间，每到一地，总要登临高处，实地观察那里的山川形胜；而他们每次有机会见面时，祝穆也总要查问风土之事的，凡是稗官野史、金石碑刻和州郡志书，只要有可供采择的内容，他就不知疲倦地、

没日没夜地抄录起来。祝穆在自序里也说，他因为“酷好编辑郡志”，所以每到一地，就要借图经（即地方志）来看，这样收集方輿风物资料的工作，经历了十多年，才算比较详备了；正式写书，“至三易稿而体统粗备”。《方輿胜览》成书的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祝穆注重调查收集资料、认真写作志书的精神；书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晶。

如果说《方輿胜览》是祝穆在顺境中艰辛缔造的巨著，那么，《龙沙纪略》则是方式济身处逆境时的精心佳构。方式济是《滇黔纪闻》作者方孝标的孙子。清初康熙年间，曾发生了“南山集之狱”。《南山集》是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的著作，书中采录了《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时事，触犯了忌讳，为御史所劾，酿成了一场大祸；戴名世以“大逆”罪被杀，方孝标被开棺碎尸，戴、方两家五服内的男女老少数百人被处死、充军，其他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处死或流徙。因此，方式济也是劫所难逃的人，他同其父也被判处斩决；后经皇帝市恩减死，这才留下了性命，父子一同遣戍到黑龙江。方式济从死里逃生之后，并没有因为不幸的遭遇而悲观厌世，苟且图安；他在遣戍期间，根据自己在当地的所见所闻，考察核实古迹，撰写了《龙沙纪略》。这是反映黑龙江情况的一部志书，有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贡赋、物产、屋宇等九个门目，很受后人的推崇，有人曾称赞说，它“既是订辽、金诸史之伪，并可补盛京通志之缺”，是“事核语详”的“輿地家不可少之书”。这件史实生动地说明，方式济被罪流徙，政治上受到了迫害，但他却

在逆境里发愤著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龙纱纪略》是方式济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的产物，是开放在北国冰天的贞洁之花！

方志学的奠基者章学诚，用自己长期的辛勤工作，经营了地方志事业的天地。他在十五、六岁时，便有志于史学，认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二十七岁时，他便随父纂修《天门县志》；自此以后，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1773—1793），又陆续纂修或参修了《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和《湖北通志》。编修这么多的地方志书，这该付出多么大的劳动！章学诚编修地方志，很注重深入民间，亲自访问了解，他在《周簋谷传》里曾追述编修《永清县志》的情况，说：鉴于“族志多所挂漏，官绅采访，非略则扰”，所以，便亲自带了车从饮食和笔墨纸簿，周历县境，目击情状；还用请进来和去走访的办法，接见了五十多人。这样深入调查、收集资料，其间的辛苦劳累是可想而知的，对于编写好志书，作用很大。章学诚的长期修志实践，不但直接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方志硕果，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修志经验，成了他建立方志学的一个基础；而方志学的建立，又对修志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培育一批又一批新的方志硕果作出了贡献。

象章学诚这样热心于方志事业的人，在历史上不乏其

人。嘉庆间天津人蒋玉虹便是其中的一个。蒋玉虹曾立志续修天津县志，采访了数十年，“故家谱牒，前贤著述，靡不搜求；缙绅诵说，故老传闻，靡不登记”，甚至“遍行荒郊破庙中，剔残碑断碣，辨其字画”，不辞辛劳地收集资料，还把收集到的材料，分门别类，积累了从乾隆初年到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8年）止的撰志资料几十本。后来吴惠元、俞樾在这一基础上增补材料，编纂了《同治续修天津县志》。蒋玉虹虽然未能亲手完成续修天津县志的工作，但他的辛勤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遗愿，由后人为他实现了。这是前后人通过接力的方式，先后相承得来的硕果。

同治年间的山西乡宁人杨笃，也是一个矢志于方志事业的人。他一生的精力，几乎都用在方志上。他从二十几岁为西宁县创修县志开始，先后编纂了《蔚州志》、《代州志》等十二种州、县志书；四十五岁时，受聘为《山西通志》纂修官，这以后，他就全部心血倾注在《山西通志》上了，即便疾病在身，或严冬时手指冻裂见血，仍然不停执笔。他说：“一身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他把“寿夭”看作是“命”定的，这诚然是错误的唯心宿命之论，但他这种甘受艰辛、扶病撰志，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以方志事业为重的献身精神，却是令人钦佩的。

中国地方志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累累的方志硕果，正是千千万万方志编纂者一代又一代长期辛勤努力得来的。

三、地方志的珍贵价值

旧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虽然重视地方志，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它的珍贵价值；他们只是把地方志作为“资政”的“辅治之书”，利用它作为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毒化人民思想、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为地主和官僚树碑立传，借以粉饰“太平盛世”、欺骗群众的工具而已。那时候，地方志这份文化珍宝，就象一个被毒蛇缠住身子的端方美女，受尽了玩弄凌辱，而她的天生丽质，智慧灵巧，却始终被毒液雾瘴严密地笼罩住了。

否极泰来。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地方志这颗瑰丽的明珠，回归到人民的怀抱，闪烁出夺目的光采了。方志的珍贵价值，受到了高度重视，有可能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了。

劳动人民最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最珍视祖国的文化。历史事实表明，作为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也最注意发挥祖国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的。早在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的1941年8月，党中央就指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和使用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每打开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只是当时限于客观条件，还没有来得及，事实上也不可能展开地方志的全面收集、研究和使用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件重要的工作便适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8年8月9日，